

目录学的党性和阶级性

王文傑

目录学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个部门。目录学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自从目录学产生以来，它就成为文化事业中观念形态（或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阶级社会里，目录学服务于统治阶级；目录学即是为满足他们阅读记载着人类知识和思想的典籍的需要而产生的。目录学一开始就为统治阶级所掌握，作为愚弄和统治人民群众的利器。我国目录学的整个发展史，生动地证明了目录学的这一阶级性的特点。

在我国商朝后期（公元前14世纪末——公元前12世纪），也即是当奴隶制社会从兴盛到衰亡的时代，这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文籍的存在，它们是记载奴隶主管国家事务的册籍。在这时期可能已经有了类似后世目录学的管理方法的萌芽。隋志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这种推论，我们认为还是合理的。

当西周和春秋时代（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5世纪），我国可能已开始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时由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相当精细，士大夫阶级著书立说，学术已经发达到了一个高峰，典籍更增多起来。孔子为了适应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将那些符合于维持旧秩序不变的各种书籍，进行了删订和整理，在他手里创制了“述作者大意”的目录学方法。

汉成帝时（公元前1世纪），刘向父子，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按照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的政策，进行了巨大的目录学工作，完成了第一部全国综合性的目录，即“七略”和它的前身“别录”。他们的书目分类体系，类目的排列，处处视儒家的经典和著作作为正统，视六艺（即六经）为万世不变的教条，都排在显著的首位。他们在自己全部书目工作中，如对作者的介绍，学术源流的敍述，图书内容的阐明，都是以其本阶级的观点加以分析、批判和评价，并向皇帝推荐某些书“皆可观”，某些书“亦有可观者”的。这就是他们的“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的工作。刘向父子的工作方法，给此后各代封建王朝树立了楷模，皇帝都以校图书、编目录，作为愚民政策的一个强有力手段。

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其相应的阶级关系的复杂化，目录学也有了某些发展。它的发展规律大致说是这样：大规模农民革命后，地主阶级篡夺了胜利的果实，接着是改换了一个新的朝代。统治阶级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加强思想统治，把持着目录学，作为宣扬封建礼教的工具。翻开历来的目录，不外儒家的经典、和作为经典陪衬的史、子、集、丛之类的作品。封建社会中目录学发展缓慢，旧分类体系持续一千八九百年之久，正是封建地主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长期统治的结果。

明末清初，汉族人民在各种著述文字里，强烈反抗清室统治。经康熙、雍正两朝惨酷的文字狱以后，排满情绪，益为高涨。乾隆帝于是假借修书之名，标榜崇尚学术，提倡文化，以便笼络知识阶层，同时乘机銷燬图书，遂其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的阴谋。为皇帝所钦定的

“四庫全書总目提要”，的确是貫彻階級原則的一個顯明例証；“提要”中的每一本書都經過嚴格審查，每一解題都從地主階級利益出發，進行了“別白得失”的評價。在編纂“全書”和“提要”的過程中，收書一半，焚書一半，其手段之殘酷毒辣，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從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進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

在封建社會末期，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也曾利用目錄學作為武器，進行了新學與舊學的鬥爭。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梁啟超的“西學提要”、“西學書目表”、“東籍月旦”等書目，正是代表資產階級改良的革命的觀點同封建思想和文化鬥爭的刀和槍，在宣傳新書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封建舊學代表者龍啟瑞、張之洞等也編制了“經籍舉要”、“書目答問”，起而捍衛封建文化，推薦和宣傳對封建統治階級有利的書籍，對新書的傳播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目錄學是掌握在地主和資產階級手里的。他們不但擯棄了目錄學革命的和進步的因素，而且採用了極端反動的文教政策。他們一方面利用目錄學宣傳反動的書籍，以消滅被壓迫階級的革命思想，一方面使目錄學與人民生活脫節，施行愚民政策，將工農羣眾排斥於教育之外。他們在目錄學領域里不但大力宣傳形式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理論，企圖影響別人並使別人接受這種騙人的論調；而且對於目錄學革命的和民主的思想採取極端殘酷的白色恐怖。任何進步的目錄學家，都要受到國民黨法西斯的摧殘和迫害。一切教育機關，都變成了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者統治的黑暗的地獄。

我國目錄學史所表現的鬥爭現象，每一時期目錄學家思想和理論的爭論問題，大致說來就是如此。在“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一文里，馬克思說：“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有由各種不同感情、幻想、思想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由整個階級在其物質條件及與其相適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來創造和確定著這一切。”（“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249頁）既然目錄學是作為思想形式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一原理也是對我國目錄學史上那些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簡括和最精辟的說明。我們也可以說，目錄學是在由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的一定社會關係（即經濟的物質的關係）基礎上所確定的。我們知道，生產關係即是階級與階級之間（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關係，那麼我們也就可以說，目錄學是由階級關係所決定，並在其基礎上發展的。斯大林說：“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的，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只要上層建築拒絕履行它替基礎服務的作用，只要上層建築從積極保卫自己基礎的立場走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立場，走到對各個階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並終止其為上層建築”。（“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3頁）毛澤東同志也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656—657頁）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這一深入地闡述，能使我們更清楚地理解到：目錄學在過去的

时代里为什么那样永远顺从它的社会制度，为什么它永远符合統治阶级的意图，永远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真正原因。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給我們提供的、了解目录学发展史的客觀标准。离开这一标准，任何想从目录学本身或别的方面来寻找目录学发展的規律，无非是一种妄想。我們的結論是：我国整个目录学发展的規律，就是各社会阶级长期斗争的明显表現。

回顧了一下我国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目录学的历史，再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關於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學說、以及上层建筑对基础起积极作用的原理來作考察，我們就能够更清楚的理解，目录学在每一个社会里的性質、作用和意义是怎样的，从而正确的解决目录学的阶级性問題。

在阶级社会里，每个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利用目录学为本阶级服务，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对每个阶级說来，他們寻求任何科学的真理和規律，并非目的，而是达到本阶级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任何一个阶级的目录学，都是阶级斗争极为重要的武器，都是符合其阶级意图的，都具有鮮明的党性和阶级性。毛澤东同志說過：“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屬於一定的阶级，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澤东选集”第3卷867頁）。

在阶级社会里，目录学工作，都以一定阶级的立場、觀点和方法来了解、評价和宣傳圖書。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 272頁）在阶级社会里，剝削阶级的思想占統治的地位。既然目录学是封建地主和資产阶级的統治工具，那么目录学也就浸透了这些阶级的阶级思想。因此我們說，在目录学領域中，封建正統派以及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级目录学理論和思想，也占据絕對統治的地位。

目录学的阶级性，在过去时代里情况是这样：当某一社会向上发展阶段，还不明显表露出来。这时的統治阶级，他們还是最进步的社会理想的承担者，他們創立的目录学內容和理論觀点还会滿足社会发展的一切要求。但是某一社会的經濟基础提出向前运动的时候，只要它的生产力和現存生产關係发生冲突，或者說和統治阶级財产關係发生冲突的話，該統治阶级目录学的进步作用也就結束。这时某些目录学家，企图以超政治超阶级的假面貌出現，以使人們相信他們的書目工作是“自由的”、“客觀的”工作。在“怎样保証立宪會議的成功（關於出版自由）”一文里，列寧說：“資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每天发行數百万份報紙來有系統地不斷地欺騙、腐蝕和愚弄穷人——被剝削被压迫的人民羣众”。（“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67頁）这种“自由”，正是更便于他們把目录学当成宣傳反动思想的工具。当某一經濟基础最后腐朽沒落的时候，阶级矛盾也达到明朗和尖銳的程度，反动政权处于朝不保夕的局面。这时，統治阶级的目录学家“不問政治”、“不屬於任何阶级”的假面具，就迅速地撕掉了。这时，目录学象其他思想形式的上层建筑一样，毫无掩飾地歌頌和維护現存的社会制度。这种情况，我国目录学史上有証明事例，在現代資本主义国家的目录学工作中，也明显表現出来。“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書目和目录的編制是用以推荐蒙混工人头脑的書籍——關於宣傳宗教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書籍和誣譖革命理論的書籍”。（克魯普斯卡娅語）在这些国家的目录里，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和其他进步作家的著作，不是根本不予反映，就是置于极不显著或极不恰当的地方。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作为阶级斗争最直接的工具，它反映阶级利益最突出的地方是在其有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中。每每是这样，越是科学的真理所在，就越是会对该现存的社会制度的腐朽与黑暗多有所揭发，也越是会多有唤起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呼声，而这些却正是最多触及到反动势力的根本利益的地方。这种概括和总结是统治阶级所不能容许的。于是就有他们的御用的学者们起来抗议，终而做出歪曲现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概括和总结。在目录学领域里也是这样，有科学的见解和正义感的目录学家假使要做进步书刊的宣传工作，也必然会遭到该社会的御用的目录学家们的进攻。

资产阶级目录学家，极力否認目录学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企图論証目录学是超阶级、非政治的科学，是与各党派斗争无关的科学。他们声称自己是采取兼收并蓄的客观主义目录学工作方法，来对待具有各思想流派和代表各阶级利益的书刊，而自己从不参与任何斗争和論战。在解放前，充斥于我国目录学领域的西洋傳統目录学理論，正是这样的。英国目录学家福开森的“目录学概論”一書，可作为这种理論的典型代表者。福开森認為目录学是書的記載；目录学家“不是書倫理学家，而是書种学家”。他极力反对：“把目录学当成一种同政治一样干燥的學問”。福开森恬不知耻的一再強調說：“目录只敍述書本，而不干涉書的內容，这又是著作家的幸运。書的內容或好或坏或平淡都与目录家无關！目录的口号是：

‘縱然內容无物，書还是書’！这是多么寬宏无偏啊！……希望目录家从事編著的时候，对于劣等的著作家要少少加一点体恤，要用尽自己的識見和寬容，去施行职务上所賦与的那种可以使人的著作或存或亡或不朽或堙沒的威权”。我国的学者，也拾人牙慧，蹈其后尘，大量輸入和贩卖資产阶级貨色。刘国鈞“图书目录略說”就說：“夫目录原以記載書籍为目的，而郑、章諸人所提倡者，乃以書中所表現之思想为对象……与以記录書籍为目的之目录，其間固自不同”。杜定友也深欣尝于此，創十万言之“校讎新義”，企图否定我国目录学数千年的优良傳統。他在該書中說：“目录惟便檢查，于学尤源流，文章派別，无所与焉”。又說：“甲是乙非，毫无意义”。并認為：“傳統觀念，阶级思想之深”，乃是我国历代目录学三条錯誤的首要一条。解放后，某些資产阶级目录学家仍散布“高級化”、“特殊化”、“兴趣化”、“超阶级”、“超政治”等謬論；并企图把专科目書及其它参考性書目当作：“抱殘守缺”、“从理想來說，固宜兼收并蓄”的最后陣地。

列宁在評論魯巴金“書林概述”的書目时，直接地、深刻地揭露了資产阶级目录学的客观主义，論証了目录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列宁說：“这部著作是‘从科学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学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方面对俄国图书財富作一概述的尝试’。本書的副标题就是这样的”。列宁接着指出該書的主要缺点是折衷主义。这一“缺点大概和作者对‘論战’的古怪偏見有關。魯巴金先生在序言中声称，他‘一生从不参加任何論战，并且認為在絕大多数場合，論战都是利用人的各种感情来模糊真理的一种最好手段’。作者沒有覺察到，第一、沒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第二、作者忘記了，他是想对‘思想史’作概述，而思想史就是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斗争史”。（“列寧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54—255頁）目录学家不能逃避由于阶级斗争而引起的思想斗争，不能不持有一定的立場和观点，因而也必然处于思想斗争之中。資产阶级超政治、超阶级的目录学理論，实质上正是“阶级的理論”。他們只是在不参加論战的幌子下，采用折衷主义的辩护和隐蔽的論战，向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进行隐蔽的斗争。資产阶级御用

的目录学家宣扬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党性，实际上正是为了掩饰其科学的党性和阶级性面貌的假面具罢了。他们企图以这种伪善的“不问政治”的说法，来迷惑和愚弄人民群众，更便利于自己驾驭目录学，自由地宣传毫无价值和反动的书刊，从而达到削弱人民群众的阶级斗志，以维持其继续统治人民之目的。对资产阶级说来，暴露其目录学的党性和阶级性的話，也就是承认他们目录学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質。

资产阶级目录学家在宣传客观主义的同时，还大力宣传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他们掩盖目录是读者和图书的桥梁这一客观规律；他们贬低目录作为宣传图书和推荐图书的思想作用。他们说什么“图书目录是一种充分冷淡的体现者，而书目工作者则是缺乏热情的登记员，把天才著作和下流作品同样都看作目录中的一个号码”。我们翻开西洋的世纪字典、韦氏字典、标准字典、牛津字典以及英美百科全书对目录学所下的定义，则大都侧重阐述目录学是研究书籍的形式的学问，至于研究图书的内容，不是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而过。读者的需要更是不肖提及的。他们把目录降低为图书的一览表，说目录是根据书名页描述图书版本特征和区别的工具。J. M. Flexner的“怎样利用书籍”，L. Shores“基本参考书”二书都认为：“目录学者，为与某一个题目或作家有关各书之书单也”。福开森也还在“目录学概论”中说：“目录学家应当研究书的版次，特点，出版地，印刷人，印刷时代，字体，图解，版之大小，校勘，装订，藏者；分类，收入何丛书，及见于何目录，他所注意的是书的客观对象，而不是书的内容的道理”。杜定友更把图书的目录比喻成商店的货物目录。他说：“目录学者，图书簿记之法也”。他主张“有其书必有其目”，详尽无遗地“罗列诸品，第其甲乙，而求便稽检用也”。这就是他在解放前后大力推销的“明见式目录”等形式主义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以上也就是资产阶级目录学家的形式主义理论根据，因此他们极力反对用一定的标准去选择图书，不主张对图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给予公正的揭露和评价。我国近代和现代的许多目录学家，曾受这种骗人论调的影响，走上了崇尚版本、玩物丧志的形式主义道路。这种形式主义的理论观点，是和资产阶级客观主义观点相一致的。我们知道，图书是记载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知识的工具，它不仅是物质的财富，而且也是思想和精神的财富。实际上，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面前，目录学工作者假若不顾一定阶级利益，不管图书的思想内容而一视同仁，正是引导读者们脱离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从而达到削弱目录学阶级性和战斗性的目的。目录学家假若把注意力集中于形式主义的纯技术方法上，他脱离开图书中鲜明生动的思想斗争，脱离开被压迫的广大阶级的利益，这正是对资产阶级最为有利的。

事实证明，在阶级社会中，目录学家永远摆脱不了统治阶级的束缚。几千年来，我国任何剥削阶级，正是为了论述他们统治地位的永恒，说明他们剥削劳动人民合理合法，推崇各种现存制度是社会的神圣基础等目的，利用大批目录学家来宣传和推荐符合以上目的的图书，创立了符合以上目的的目录学的理论观点。持有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目录学理论观点的人，大致说来，是由统治阶级的代表和受统治阶级影响的目录学家所组成的。对前一种人说来，为了达到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使自己的后代长期保持住这一统治的目的，他们从来就是把目录学当成自己世袭的领地；宣扬反动的理论观点，这无非是他们的一种自我保卫的本能。对后一种人说来，他们则是受前一种人的影响，是用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偏见和习惯，用敌视劳动人民的精神所培养和教育出来的。因为这样，他们也必然屈从剥削阶级的政

策，向反革命阶级作政治上的让步，并且以最忠诚、最忘我的态度为有产阶级服务。但总的说来，以上两种人的立足点都是在剥削阶级方面。他们灵魂深处都还是一个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王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的胜利，终结了剥削阶级的制度，剥削阶级统治目录学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对资产阶级目录学家来说，不明确认识和彻底地解决立场问题，不完全摈弃过时的“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观点，是不能为新社会服务的。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在残酷掠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目录学，为统治者和他们的僕从们所掌握。整个说来，在目录学领域里，统治阶级目录学的理论和观点占据统治地位。被压迫阶级缺乏文化，精神上处于贫困状态，他们不可能以自己的观点独立地创造和发展自己目录学的理论和观点。但是，我国从“五四”运动之后，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了自己，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在这一时期，党利用了目录学，在党的刊物和进步刊物上，经常刊出一些紧密结合工人阶级对敌斗争的书目，宣传和推荐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政治积极性的书刊，使目录学从内容到形式，有了极大的变革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目录学，由于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所以它具有最进步、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因素；同时也是此后目录学发展的主要的因素。

在解放之后，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无产阶级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政权，我们改变了目录学的性质，并正在逐渐地建立着崭新的社会主义目录学体系。这就是说，我们要使目录学的发展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这就是说，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目录学的同时，我们还要为摆脱和清除剥削阶级目录学的影响和流毒进行斗争。社会主义目录学的内容和形式，党性和阶级性，就是在以上两时期的艰苦斗争中产生，发展和锻炼出来的。

列宁在论述文学的党性原则时指出。这种原则不仅仅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是说，文学事业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先锋队所发动的社会民主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这一党性原则的定义，不仅是对文学，而且也是对目录学最深刻的指示。目录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是说它必须是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我们的目录学的党性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和兴趣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去主观地选择、评价和推荐图书的。恰恰相反，我们的党性必须是以最进步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党的目前任务，广大人民切身利益为根据的。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和现代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才能代表广大人民最长远最切身的利益，所以我们的党性也具有真正的人民性。

社会主义目录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实际需要，它必须以党在某一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出发，紧密地为我国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服务，为社会主义生产需要服务，为广大工农兵读者的需要服务。这种需要，不是幻想出来的需要，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这又正是我们社会主义目录学的强烈现实性的表现。

社会主义目录学反映了在目前占我国統治地位的世界觀，即无产阶级的最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觀。这一世界觀并已成为社会主义目录学賴以迅速而順利发展的科学理論基础和思想基础。辯証唯物主义特点之一，是它的党性和阶级性，毫不隐晦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辯証唯物主义要求最正确最深刻地來認識客觀世界的本質，并且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最正确地掌握各种事物的发展規律。这就要求我們的目录学公开地从人民利益出发，用辯証唯物主义的立場和方法來研究图书。我們應該宣傳那些捍卫和促进新生的进步的事物成长的优秀著作；我們應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全面地研究、分析和評价那些历史上的典籍；我們應該对过去和現在的唯心主义反科学的作品，給以严肃的原則性的批判和进行坚决的不調和的斗争；我們應該摒棄那些毫无科学价值的陈旧作品。真正的辯証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已被社会历史的发展，被最新的科学成就所證明。辯証唯物主义的內容，就是我們的目录学的党性內容。因此，我們目录学的党性，是对图书最客觀、最全面、最公正的态度。我們的党性是真正科学性的表現。

我們的社会主义目录学有最科学的基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有强烈的現實意義。因此我們决不掩盖自己目录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党性和阶级性是我們社会主义目录学的灵魂。这就是我們应在整个目录学的理論和实践中，強調貫彻党性原則的根据之一。

另外，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正象初昇的太阳蒸蒸日上，劳动羣众对文化和科学知識的追求，已經形成了一个波瀾壯闊的高潮。摆在社会主义目录学面前的主要任务，也就在于通过書目来宣傳图书，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羣众，在于使目录学为阶级斗争和新旧斗争服务，在于使广大人民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目录学家都必須有全心全意地、坚决地、始終不渝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高度热忱，都应当同党的思想和政策緊密地联系在一起，都应当在自己工作中充滿党的精神。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对具体图书和讀者采取具体的态度。这也就是我們強調貫徹党性原則的主要根据。

貫徹党性原則，这就要求我們在整个書目实践中，时刻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我們要想了解和体会目录学怎样貫徹党性原則這一問題；还必須首先仔細地研究一下列宁作为“卡尔·馬克思”一文附录的“馬克思主义参考書目”。列宁这一書目把馬克思主义和反馬克思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对各种著作的选择、分类和評价，為我們作出了貫徹高度党性原則的典范。这一書目与正文彼此互相补充，組成了統一的整体。它显示了“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由于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在資产阶级社会里展开的一幅思想斗争的图画”；它是我們書目工作者吸取力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貫徹目录学党性具体說來，則要求我們做到以下几点：

一、書目主題的选择和确定，应以党的总路綫精神和当前中心任务为根据，結合当地生产建設和科学硏究的具体任务，以及讀者对象（首先是工农羣众）的不同需要（如文化程度和閱讀兴趣），来考慮应編制什么样的書目。主題确定后，也应时刻根据以上具体不同的情况和条件，采取不同的方法，創造出百花齐放、灵活多样并为讀者所喜聞乐見的形式。这就是我們所提倡的阶级的、民族的风格，而不是教条式的死板公式去編制書目。書目編制和編成以后，我們还應該宣傳使用書目的方法，調查書目的使用和效果。只有这样，才是对編制書目严肃認真的态度。

二、图书的选择，应将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党中央的決議，党的領導人的

著作以及党的刊物上的文章，反映在書目中的首要地位。另外，还應該采取認真而严肃的态度，以人民最高利益为标准，也就是按毛澤东同志在“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中，所提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来审查其他图书对社会主义建設的作用，宣傳和推荐具有高度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图书。

三、图书內容的鑑定和評價，我們應該仔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文学、批評、艺术和科学的言論，学习他們分析作品的态度，从中獲得教益，对書目中收录的图书的思想和政治觀點，給予党性的分析和評價。我們在評價古代文献时，应以当时的科学水平，以及在当时和在目前的价值，而采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我們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評價图书时，还应掌握其基本理論原則的实质，以无产阶级的利益全面地考查作为記載思想的图书的总趋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先进思想的宣傳，才能批判反动的思想和觀點。只有这样来編制書目，才能实现書目为讀者服务和宣傳、揭露图书的作用。

四、图书的分类和排列，应滿足最大限度的宣傳和揭露图书內容。應該根据新的生活和新的任务，根据科学的最新成就，去編制或审查分类表和类目，使其符合書目的現實要求。我們說不顧讀者对象、不顧科学的体系和最新成就而隨便分書，是一种輕浮的不负責任的态度。

高度的思想性、原則性和政治警惕性，明确的目的性，这是对每个目录学家最重要的要求。目录学家遵循着馬克思列寧主义觀點，掌握着社会主义目录学的党性原則，在选择、評價和宣傳图书上才有正确的科学标准。只有掌握着这样的科学标准，才能使那些具有真正先进文化和科学成就、促进社会进步的宝贵精神財富得以发扬光大，才能使那些反动的、錯誤的和伪科学的觀點得以批判揭露。这样，目录学就会成为以馬克思列寧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讀者的良师益友，就会成为党的思想工作的得力助手；換句話說，就能促进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最后我們再重申一遍，当我们們在宣傳和貫彻目录学的党性和阶级性的同时，我們必須和墮落腐朽的資产阶级目录学理論和觀點，即和“客觀主义”、“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等反动觀點进行斗争。因为这些觀點是和社会主义目录学的党性和阶级性直接对立的，是影响目录学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对現實書目工作影响最深最坏的毒素。这种目录学領域里思想上、理論上的斗争，按其性質說來，是两条道路长期斗争的过程。在“介紹一个合作社”一文里，毛澤东同志說：“一切腐朽的意識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紅旗”1958年第1期 3頁）讓我們認清这一形势，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水平。杜絕一切資产阶级觀點对我們的侵蝕！

1959.8.25

（本文原是“目录学”講义第二章，并經作者略加修改补充）